



親歷
史

丛书主编 李辉 向继东

『文革』

中的我

于光远 著

一份来自风暴中心的
珍贵记忆
一份直面社会灾难
的内心独白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革』

中的我

于光远 著

丛书主编 李辉 向继东

親歷
史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革”中的我 / 于光远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
(“亲历历史”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957 - 9

I. ①文… II. ①于… III. ①于光远-回忆录 IV. ①K8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697 号

“文革”中的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谢海宁 周米亚

装帧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网址: <http://www.gdpph.com>

经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6957 - 9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560

关于“亲历历史”丛书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对亲历了深刻影响社会、改变他人命运的重大事件者来说，更是如此，个人经历的自述，是整体历史的映射，历史的亲历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出了历史求索的当下指向和主观性，也说明了解读当代历史的意义。但今日不少国人，特别年轻一代，对当代历史往往陌生。他们可能对千百年前的皇朝故事说出一个子丑寅卯，但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却不得而知或不予置信。国家文化认同和个人精神家园的建造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离不开家国历史的传承记忆。历史在当下断裂，文化的飘摇、信仰的迷失与物质主义的甚嚣，与此攸关。

历史亲历者的自述有利于还原历史事件和社会整体历史真相，有利于揭示社会变动时代的个体生命境遇和心迹，有利于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也能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预期，随着亲历者的年华老去，他们这些珍贵记忆将如一坛陈年老酒，散发着岁月的芬芳。

无视亲历者记忆的主观性是不现实的，我们并不否定记忆的偏差，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这些主人公的记忆，为历史解释提供多一种可能。

处于或接近风暴中心的人，才更能讲清风暴。列入亲历历史系列者，主要是当代重大事件制造者、参与者，影响社会进程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以及与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者。

纳入本丛书的每一种选题，或是叙述者对参与的某一或几件重大事件的记述，或是众多亲历者对某一事件、人物或现象的记述。文体均以第一人称形式呈现，可以是亲历者直接书写，也可以是亲历者口述、他人整理。忆述者描述当时的历史场景，直接记述过程本身和个人心迹。我们不希望将其写成个人自传或历史评论。

从历史亲历者的口中重寻读者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描摹历史的原色，彰显当代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将干瘪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理想。期望有同好的历史亲历者、历史书写者和历史研究者以及关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与我们同行。

出版者

目 录

一、“文革”前期本人的趣事、憾事和琐事

小 引 / 002

失去了到西藏的机会 / 004

第一次挨斗 / 006

头发的故事 / 007

免遭抢夺之苦 / 009

“终生日记”的厄运 / 013

是可忍，孰不可忍？ / 016

讨厌的“请示病” / 018

摸一下“老虎屁股” / 020

真诚而错误的检讨 / 023

培养经济数学人才计划的破灭 / 024

当了一回“胜利者” / 026

“你对他笑干什么？” / 028

要革命的干部 / 030

二十年前的一笔“账” / 031

挨打纪实 / 033

“牛棚”生活 / 035

抄家和搬家 / 038

下干校前的准备 / 041

后 记 / 042

二、干校生活

- 征服什么自然！还是征服你自己吧！ / 046
- 劳动中的乐与苦 / 048
- 读书生活 / 055
- 校内社会交往 / 058
- 上银川 / 061
- 文娱生活 / 065
- 小女儿们从远方来 / 066
- 《小东小字典》及其他 / 072
- 第一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075
- 走过场的批判会 / 078
- 坐井观天 / 081

三、“文革”后期的经历

- 和亲人们在一起 / 086
- 自己恢复自己的工作 / 090
- 熟人们渐渐走到一起来了 / 092
- 评法批儒 / 096
-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099
- “出山” / 101
-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 105
- 关心文艺方面的事情 / 110
-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 114
- 重理旧业 / 115
- “文革”中新上台的大人物 / 117
- 山雨欲来 / 119
- 挨批前抢着做的一件事 / 121
- 又一次受批判 / 122
- 去了天安门 / 124
- 大地震之后 / 125
- “四人帮”粉碎的第二天 / 127

后记 我写“文革” / 131

附录 与“文革”有关的三篇文章 / 139

再版后记 / 158



『**文革**』前期本人的趣事、憾事和琐事

小 引

我答应用这样的题目写篇文章交给一本文集，这已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现在交稿的日期越来越近，可是手边要“优先处理”的工作总是那么多，腾不出时间，而本人的健康状况自知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通宵达旦地伏案写作了，于是决定偷一次懒，请陈小雅来，我提供素材，告诉她我的想法，由她写成文章。

不过，这个“小引”我想还应该自己动笔。

如果把一九三五年作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起点，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一共有四十一年。在这四十一年中，前后两次加在一起倒有十二年自己是处在革命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处在专政对象的位置上。一次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事实，自己忠诚地献身革命，却会处在那样的位置，后来越来越明白，历史发展的客观历程并不如自己原先所想的那样简单，中国人有我那样的遭遇的也并非我一人，这样也就想得开了。同时我也有些“阿 Q 主义”（为了别于鲁迅笔下那个愚昧落后的阿 Q，我称之为“革命的阿 Q 主义”），什么事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以求知而言，世界大也无限，小也无限，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在那些年份，我过得并不那么“凄凄惨惨戚戚”，有憾事，也有自得其乐的趣事。我也一直在观察世界，增进知识，有机会我还找些自己开心和让别人开心的事做做。现在把“文革”这几年中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可以使读者了解我在那样的日

子里是怎么过的一个侧面。限于篇幅。它只能包含“文革”前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下干校前的这一阶段。

写这些东西，我把握这样一个精神：不讲大背景，不对中国这段历史讲自己的看法，而只写那些年中自己亲身经历的琐事，而且在写这些琐事时，也不考察逻辑关系，不求连贯，而是对一件一件的事实经过逐个叙述，也讲一点当时自己的情感，而不去发表多少议论。每篇文章总想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同时也只有这样去写，才便于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做，丝毫不意味我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漠视，恰恰相反，我是多么希望看到在我国有人经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本着对历史、对真理高度负责的态度，写出若干部史料充实、观点正确、逻辑缜密、见解深刻的学术巨著。中国多么需要有这样的书问世！“文革”十年这段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文革”十年的教训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文革”的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作了基本概括，这个决定应该长期得到重视，而且应该得到发挥。现在和今后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以从“文革”的教训中吸取答案，找到解决途径。中国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科学的著作。中国决不能忘记“文革”的教训。因为我现在写的只是一些琐事，我不希望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不主张去对“文革”做极为严肃的研究，因此在这个小引中我不得不作这样一番申明。

“文革”开始距今已经二十六年了，那时还不那么懂事，甚至还不知记事的小孩现在也已经三十多岁了。就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事隔多年，许多遭遇也都淡薄了。这里写的那些琐事，之所以现在我还记得比较清楚，那是因为当时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的缘故。即便如此，它们之中有的也已经有些模糊，有的是逐渐回忆起来的。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而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那些不该过分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是另外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一回事。应该把这三者区别开来。我国十年“文革”这段历史总的说来是不应该使它淡化的，它对中国人民的教育意义实在是太深刻了。我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不能把握未来。”何况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还在起作用，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起作用。也可以说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淡化，不过许多人看不出这点罢了。所以我认为，该淡化的东西就让它们淡化吧，不该淡化的还是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让人们记得牢固一些。我讲的这些故事，本来属于随便讲讲随便听听的范围，本来就不“浓”，说不上什么淡化不淡化的问题。

失去了到西藏的机会

“文革”前，我在中宣部工作，兼国家科委副主任，科委医药卫生局是由我分工主管的。一九六六年，算起来应该是五月，中央血吸虫病小组在成都召开会议，我随魏文伯坐专机从上海飞到四川。我对游历中国大地有一种特别的爱好，不论“人工的自然”（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和天然的自然，我都喜欢观光。恩格斯说，自己不能不生活在适于观察世界历史和工人运动的大城市，但是一旦有机会投身到大自然时，得到的是另外一种喜悦。我与他有同感。当时

成昆线正在兴建，我就借机经西昌西行，看看这伟大的工程建设。事情由我倡议发起，响应的有杨西光等人。沿途山势陡峻，道路崎岖，我们一行的“坐骑”经常置身绝境，自然是有一番险情。但一行中唯有一人怯形于色，时常“哎呀，哎呀！”叫出声来，弄得司机心烦意乱，平添干扰。

正巧，当时主持三线建设工作的彭德怀也在这一带视察。肯定是上面有指示，安排参观的人有意将我们一行与彭老总错开：我们参观这里时，让彭总参观那里，然后再调换。但三线的接待能力有限，一天参观完毕，大家终归要会到同一地点夜宿。住宿的地方就在大道边，几栋平房，又逢初夏，所有房门都大开着，在马路散步的我一眼望进去，彭老总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来，挥舞着手臂，兴高采烈地在谈话。也许彭总对自己的“软隔离”状态并无觉察，所以仍然高谈阔论，声播四邻。我们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屋子里，虽然不得与他正式见面，也算是列席旁听了。

成都会议闭幕后，我请当地同志买机票，想去西藏。因为时值夏令，出行的气候正好，又已经到了成都，高原遥遥在望，此时不去，更待何时？但是，我忽又想到离京日久，家中还有不少工作，于是决定以后再去。

谁料，在北京等待着我的，并不是那些我放心不下的工作，而是“砸烂阎王殿”的指示。我也是殿中人，回来后不久，便成了专政的对象，而且一整就是十来年。一九八〇年，我发起创立中国国土经济学，立志走遍中国，包括到边远地区实地考察。全国所有省份都到了，只有两个省份例外：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西藏。西藏那次没有去成，而我现在上了岁数，这个省份看样子是去不成了。本来我想作自己的简传时，有一个于某在中国国土上足迹东南西北“四至”，海拔高低“两至”的记载，但我现在只能具体写成：于某

北至漠河“北极村”，东至图们江畔的“东方第一哨”，南至海南三亚“鹿回头”，西至新疆中苏边界的格登山，得以俯瞰山下苏联的苏木拜农庄；低至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但是，高至西藏某处的记载看样子是写不进去了。这件憾事的账还要算在“文革”的头上。由于这事发生的时间最早，所以在各篇之中，就让它名列第一吧！

第一次挨斗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是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被称为新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

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

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面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了。只听见“嘭”一声，人倒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时，我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颇为得意。斗争会上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用全部注意力在做一种体力上的磨炼，而且成功了。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

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

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头发的故事

一个人的尊严，大概与一个人的头是很有关系的，而一个人的头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头发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没有一头好的头发，总觉得有些遗憾；买一个假发套，如果与身份气质不

符合，也会使人倒胃口。可见头发确实是很重要的。

“文革”开始，我还有一头完整的头发。

有一次，学部的人到中宣部来造反。其中一个女的看见我的头发依然完好，于是对我大喝一声：

“好！于光远，你还逍遥法外！”

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上来，“咔嚓！咔嚓！”对我的头“开刀”了。原来，这也算革命的一个项目。她的手里早已预备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后对着你喊一通口号，再扬长而去。

我看自己的头实在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发室请他们重新理一理，没想到他们好像也有气，把我的头发理得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家里。我夫人从外面买回一把理发推子，把我剃成了平头。从此以后，我的头发都是我夫人帮我理的，几十年下来，倒省了一笔洗理费。后来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少年了，我该付你多少款呀？”

这事使我想起清朝有一首“流行歌曲”，不过可能有词无调，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剃头歌》，“歌词”是这样的：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清朝统治者实行“留发不留头”的专制政策，太平天国的造反者为了表示反抗，依明朝习俗留发，所以谓之“长毛”，这在清朝统治下是要杀头的。这也是说明头发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有意思的是，后来夏衍将这几句话改了，用来形容发生在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很有新意：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我把它取名叫《整人歌》。

免遭抢夺之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竞争是很激烈的，抢人，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

有一天，北京对立的两派同时各要开一个批斗大会。一个是全北京的“地派”^①批斗大“走资派”的一个联合行动，属于“地派”的学部的“联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还有一个是属于“天派”^②的学部的“总队”，以批判学部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为由头斗争“走资派”。为使批斗会开得有声势，被揪到会的人物的级别和知名度，是体现“革命”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这些“革命对象”事先并不知道。

大会的前两天上午，我听说学部哲学所要斗我，就跟着一个前

① 赞同“文革”时北京著名造反组织“地院东方红”观点的派别简称。

② 赞同“文革”时北京著名造反组织“北航红旗”观点的派别简称。

来押送的人，到学部去了。学部当时是有名的“斗人”机关，这次主要是斗我，我以为总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可是，没想到批斗会开得很稀松，精神也涣散，发言缺少内容，说话也没有什么力量，陪斗的只有一个“小判官”龚育之。斗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过一天又通知我，说哲学所还要斗我。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押送我了，从沙滩到建国门，走起来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吧。也许是我这人有守信用的信誉，他们也乐得轻松，也就同意不来押送了。我骑车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回连陪斗的龚育之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有几分寂寞。斗争会开得比头一天还稀松，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

开过斗争会后，还不让我走，中午还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也不让走，说是要我写检讨，交代问题。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刘、关、张、杨^①都在，加上我，一共五个。我们一人一张桌子。一个红卫兵跷着“二郎腿”命令我们：“你们写！”

写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杨述便去问监视的造反派。那人一听，勃然大怒：

“你自己的罪行你还不知道？还来问我！”

原来，我们只要动笔就行，至于写什么，谁也不知道。

大概是杨述提了问题，那个红卫兵就走到他跟前看他都写些什么。没想到，他写的竟是自己和号称“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光荣经历。那人一看，又火了：

“你还有斗争？这不行。检讨就是检讨，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到了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说是明天另一派要斗我，会狠狠地整我的，他们自称有责任“保护”我。我有点着急了，于是说，出

^① 即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杨述，当时都是学部的领导。